

勇敢地向前……

——读太康籍、我国优秀作家曾克

□王天瑞

书香世家女

曾克说：“我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应该说，曾克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

曾克的太爷、爷爷都是读书人，都是考上的儒门秀才，都是以私塾即教师为业。曾克的父亲曾次亮191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专业，接受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信奉唯物论。1949年9月，曾次亮被调到北京，先后任华北教科书编委会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编辑。1954年后，他又先后转任古籍出版社编辑、中华书局编审。

曾克在家中是长女。她有三个妹妹曾兰、曾耘、曾恬，一个弟弟曾一平。当抗日枪声打响的时候，家里除曾恬外全部参加革命。1948年夏，曾次亮携妻和幼女曾恬投奔豫西解放区，刘伯承、邓小平接见了他们。曾次亮夫妇也见到了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大女儿曾克。那时，曾克已是第二野战军新华社野战记者团叱咤风云的著名随军记者了。

璀璨斑斓星

曾克说：“我在文学创作的山道上艰难攀登。”应该说，曾克是一位一举成名的璀璨斑斓的文学巨星。

1917年4月4日，曾克呱呱坠地。1922年，曾克5岁即入母亲武翠莲（武育英）创办的私立小学读书。1929年至1936年，曾克走进著名的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她喜欢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还从父亲和老师楚图南、柯仲平那里，看到了新潮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新文学》。这些是促使她创作文学作品的巨大动力。

1938年，曾克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引起全国文艺界的震动和沸腾。曾克一举成名。《在汤阴火线上》主要讲述捉汉奸、包饺子、美人计三个复杂故事，表现了战士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奋勇杀敌的伟大精神。文艺界普遍赞誉曾克是新星、璀璨斑斓的文学巨星。事实也证明，《在汤阴火线上》与后来创作的《挺进大别山》，为曾克成为我国文学巨星奠定了基石。在两三年时间里，曾克在武汉、重庆和香港的十来种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达30多万多字。

能文能武兵

曾克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兵。”应该说，曾克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兵。

1940年，挣扎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贫病交加的曾克，经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介绍，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这年6月，曾克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曾克满腔热忱地走进晋冀鲁豫太行山根据地，深入群众中体会生活。她在那阶段创作的作品，先后辑成散文集《光荣的人们》、小说集《新人》。

烽烟刚散，战火又起。1947年春，曾克正式走进人民军队，正式穿上军装，正式成为一个兵——在第二野战军新华社野战记者团任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北战南征。1947年夏，刘邓大军要执行挺进敌人心脏大别山的反攻任务。部队决定，除卫生部门和文工团的女兵外，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曾克闻讯后，月夜紧急向刘伯承、邓小平请战，终获批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曾克又担起土改工作队队长，投入到重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同时，曾克夜以继日，在破旧黄裱纸上刻苦创作，又写出一部引起全国文艺界震动和沸腾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在序文中说：“这部书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仍然是隽永的。”这部书，1950年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直到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应广大读者要求，还在继续重版。《挺进大别山》为曾克成为我国文学巨星又奠定一块基石。

笔耕不辍者

曾克说：“惭愧，这几十年我写得不多，感人之作更少……把思想集中，考虑如何抓住不多的余年，总结几十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为人民再写些东西……”听，曾克说的何等真诚、何等恳切、何等谦恭！试问，知道自己不足的人、永远不知满足的人，能不奋力努力吗？能不迅猛进步吗？能不夺取更大成绩吗？曾克从1937年发表处女作，直到2009年停笔，70多年来，始终勤奋地写呀写，写的著作等身。

1949年9月，曾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协和文代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0月1日，曾克参加开国大典，见到了毛主席。在沸腾的人群中，曾克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她。啊，原来是周总理。周总理马上握住曾克的手，说：“你怎么还是这样瘦啊，解放军不会吃不饱吧？对了，大概是在大别山跟‘小保队’（地主反动武装）斗争累了吧？在首都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可不能停步哟！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曾克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曾克记住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勇敢地向前……

1978年，曾克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任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风》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曾克用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赤诚和汗水，辛勤笔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文艺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重阳节为何被定为敬老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重阳节的习俗有登高远眺、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因此，重阳节也叫“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1989年，我国政府将农历九月初九正式定为“中国老人节”、“敬老节”，重阳节又成为一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节日。2012年12月28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日作为老年节。因此，今天也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生效后，我们迎来的第一个法定的“老年节”。那么，为什么将重阳节定为敬老节呢？

在中国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为“极数”，指天之高为“九重”。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双九，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故称“重阳”，所以这一天为重阳日。因为“九九”重阳与“久久”谐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因此，重阳节寓意深远，自古以来，人们就对重阳节怀有特殊的感情。

重阳节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季秋纪》记载，季秋九月，“仲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

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祇敬必饬……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那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习俗。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在《远游》诗中也有“集重阳入帝宫兮，造句始而观清都”的诗句。不过，这里的“重阳”当时还不是节日。而重阳节的求寿之俗，据考始于汉代。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把重阳当作一个节日，最早见于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曾这样



描述当时的重阳节：“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飨宴高会。”到了魏晋时期，重阳节又多了赏菊、饮酒的习俗。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重阳节被正式定为节日，则始于唐代。此后的宋元明清，每逢九月初九，宫廷、民间都会一起庆祝重阳节，并且在节日期间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唐代的许多大诗人如王勃、孟浩然、李白、王维、杜甫等，都留下过关于重阳节的著名诗篇。（舒智吉）

重阳节登高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重阳节登高的风俗历史悠久，其由来大致有三。其一是登高避灾，其二是古人的山岳崇拜，其三是登高“辞青”。

登高避灾源于汉代，有汝南人桓景在九月九日登高以避灾的故事。桓景是东汉汝南（今河南省平舆北）人，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然而，《续齐谐记》不过是一部志怪书，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把它视作史实。晋代葛洪《神仙传》卷五记载，费长房在东汉时曾做过汝南市掾（街市小官），后来跟仙人壶公入山修道。可是，桓景其人在有关东汉、三国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中均无记载。后来的《宋书·符瑞志》中倒是提到过东晋成帝时有个叫桓景的太守，但时间上已相差百余年。显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有人提出，登高其实是源于古人对山岳的崇拜。《礼记·祭法》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古代先民生存环境极其艰苦，大多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大山中生长的各种植物、隐栖的飞禽走兽以及潺潺溪流，使人类才得以生存繁衍。如果逢高温干旱，山间密林可避高温炙烤；洪水袭来，攀上高山可躲灭顶之灾。此外，古人认为山上云雾缭绕，为呼风唤雷电之神龙所居。而且，高山的雷电可以带来火种，利用火可以吃到化腥臊的熟食。因此，古人对山既敬畏又充满崇拜，“登山祈福”的习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开来。持此观点的人还将“崇”字本身作为旁证：“崇”，形声字，从山，宗声。崇拜之“崇”原本就是对山岳而言，因为“山”即高山，“宗”为神圣。以“宗”喻“山”或以“山”喻“宗”，都蕴含有尊崇、敬畏之意。

登高“辞青”的说法则源于大自然中的节气。重阳为秋节，节后天气渐凉，草木开始凋零，重阳节登山“辞青”与古人在阳春三月春游“踏青”相对应。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重阳）有治肴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舒智吉）

千叟宴为何被称为“敬老宴”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封建王朝中，为后世或津津乐道或口诛笔伐的“千叟宴”当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敬老活动。清康熙和乾隆皇帝曾先后各两次邀请全国各地的数千位老寿星来京师共赴御宴。而且，根据寿星的年龄，有的赐给诗刻、如意、寿杖、朝珠，有的赠“八品顶戴”赏穿“黄补褂”，有的颁发重量不等的“养老银牌”，有的甚至由皇帝亲自敬酒，以表示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因此“千叟宴”也被称为“敬老宴”。

所谓“千叟宴”，其实就是清代老寿星们的大聚餐，始于康熙，盛于乾隆。因康熙五十二年在畅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时，康熙皇帝在席间赋《千叟宴》诗一首，故得宴名。

康熙皇帝第一次大办“千叟宴”是在乾

熙五十二年（1713年），那年他恰逢“花甲”。康熙认为：自秦汉以降，称帝者一百九十三，“享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所以，决定举办万寿大典庆贺60寿诞。他昭告天下耆老，年六十五岁以上者，官民不论，均可来京城参加畅春园的聚宴。清礼部也特别作出规定：“今岁恭遇万寿六旬大庆，非寻常可比”。于是，在全国的老寿星们中选了两千四百一十七位七十岁以上的人参加畅春园盛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69岁，为了预庆自己70岁生日，又举办了第二次“千叟宴”，并把地点改在了紫禁城的乾清宫。

乾隆皇帝效法祖父，也先后举办了两次“千叟宴”。第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为了纪念继位50周年，75岁的乾隆举办了第一次“千叟宴”，地点也是在乾清

宫。第二次“千叟宴”是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乾隆86岁，这时他已经退位做起了太上皇，地点改在了紫禁城宁寿宫的皇极殿。乾隆皇帝的“千叟宴”场面之大，人数之众、排场之奢，都远远超过了爷爷康熙。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清宫的这次“千叟宴”，被邀请的老寿星多达三千余人，其中既有皇亲国戚、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寿星。御宴上，乾隆皇帝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据说当时一位最年长的寿星已有141岁，于是乾隆皇帝和纪晓岚就为其做了一副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上联意为：两个甲子之和120岁，再加三七二十一，正好141岁；下联同样工整巧妙：古稀双庆是两个七十，再加一，也恰好141岁。（舒智吉）